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 卓泽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如何理解“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这一论断，是我们学习十九大精神时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从历史看，中国的国家治理并非法治而是人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治尤其是宽仁厚爱的仁君之治、明君之治还是很好的。就是在绝对值的意义上讲，它也比暴君之治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评价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根本的是要看它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包括经济基础是否相适应。中国人的人治传统本身就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它所依赖和体现的是仁

君之治、明君之治是很正常的。农业经济、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也决定了它的国家治理方式必然是人治，最好的也就是仁君之治和明君之治。只是到了近现代，我们的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工业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这时还固守仁君之治、明君之治，也就当然地落后了。

从未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法治化。未来，中国的生产力只能是现代工业、现代商业、现代市场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我们的国家治理必须也只能是法治。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其实就是自由、平等、法治。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再者，

我们未来的政治是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作为与民主政治相匹配的国家治理方式，也只能是法治。人民的意志通过什么来表达，通过什么来统一？回答，只能是法律。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民主政治的逐步建立都对中国提出了急迫的法治要求。

从现实看，中国的国家治理正在法治化。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近法治而远人治、用法治而弃人治。再过两天，就是中国独创的节日“光棍节”。它实际上是一些青年人和电商有意无意地“合谋”而产生的节日。这个节日在去年一天的网购销售额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它由无从计数的合同和法律关系构成，一旦发生了矛盾

纠纷，恐怕只能是通过法治化的方式包括诉讼等方式来解决。这就是生产力的伟大作用，也是生产关系的伟大作用。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确立的治国方略，也是对我们党和国家的考验。我们不能不接受这个考验，而且必须在这一考验中获得良好乃至优秀的成绩。这是党的要求、是人民的要求，也是法治的要求。

从历史、未来、现实的三个维度来考察，全面依法治国必然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只能急流勇进，积极投身这场革命，才不会落伍，才能迎头赶上。中国的依法治国的事业，才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理论逻辑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董振华

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7日上午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我国发展的逻辑，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十九大报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理论基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理解十九大精神，这就抓住了根本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主张知行合一，正确处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这是谋划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逻辑。整个人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认识世界，另一个是改造世界。有效改造世界必须以正确认识世界作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谋划和伟大胜利，必须以正确的认识，即正确事实判断和合理价值判断作为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是要作出正确的事实判断，“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要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这两个“牢牢把握”，是进行伟大实践的基本前提。十九大报告始终贯穿一个灵魂，即“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价值追求和初心；始终立足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们进行一切决定和实践的历史方位和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要求实事求是，把正确的事实判断作为决定和实践的前提，这是谋划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事业的基本依据。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两个没有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党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对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作出的新判断。我们要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变，决定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和促进其他矛盾和非中心工作的解决。

主要矛盾的转化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至上，把崇高的价值追求作为不变的初心，这是谋划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事业的价值旨向。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价值追求和逻辑起点，这个价值理性也一直处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和纲领体系。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解放实践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通过发展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实现人对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有效控制，把人从自然界的盲目必然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第二，通过革命性实践摆脱社会中阶级的奴役和压迫，使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让人民大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两个解放是互相贯通、互相交织，最终统一到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实践中。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即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通过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让人民大众吃好“蛋糕”，共享发展成果，这些论述都体现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即造福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站在“造福人民”这一共同价值的制高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样的表述，使中华文化母体地位得以确立，并在我们党的手中得以更新、发展、壮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极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西方现代文明，尤其是英美从林规则、均势理论，一反传统的共同体观念，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国际秩序带来了各种弊端，正需要中国协和万邦、天下归仁、平天下的理念来纠正，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必须回到世界舞台中央，担当文明传播责任。

我党将文化自信写入党章，将有力推动党的文化认同，提升党内政治文化。全党同志必须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使命，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华文明永续发展。

正确判断所处历史方位的重大意义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 罗平汉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因为只有认清了历史方位，才能准确地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并由此决定党的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1927年4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

质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不能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应当作为革命可争取的力量。但是，当时党的领导层却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少数人对蒋介石的追随，看成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背叛了革命，认为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因而提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从而孤立了自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理由是无产阶级有两个祖国，即阶级祖国和民族祖国，首先要保卫的是阶级祖国即苏联，这就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了准确的判断，对中国基本国情逐渐有了深刻认识，从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的客观实际出发，向各党派派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倡议，大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同时也大大改变了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与尊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由一个“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即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生产力水平很低，因此，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就应该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共八大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强调：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

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十分遗憾的是，这个合乎实际的判断并没有坚持下来。随着1957年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由于对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失误与失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将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田单干，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严峻，进而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随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回复到了中共八大所作的正确判断上来，果断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国内主要矛盾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因为正确判断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国家的综合实力、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从而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也必然要求党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重新审视。十九大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的新判断，表明我们党对自身的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历史方位的转换，既是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又关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新的历史方位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总依据，这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文化自信与文明复兴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 李文堂

党的十九大将文化自信写入报告与党章，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提升了文化的重要地位，强化了文化的社会政治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这种文化自信、中华文化立场，贯穿在历史使命、政治制度、文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从严治党等报告内容之中，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观与文明观。

文化是文明的灵魂，文明承载着文化精神。十九大报告表达了我们党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明自觉。报告设单章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以强烈的历史感将中国共产党

置入中国文明延续与发展的初心、使命与征程中，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灾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呢？不仅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复兴，而且意味着一种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意味着一个文明体的复兴。这个文明体被汤因比等历史学家称为

世界国家，具有“克明俊德、协和万邦”“天下归仁”“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所谓汉唐气象，就是具有处于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形象，具有繁荣兴盛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吸引力！这样一个文明体，不但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具有同等重要的文明地位，不仅在轴心时代文明中占有重要席位，而且至今绵延不绝并愈发光辉灿烂。她的复兴，必然要再一次改写世界历史。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之所在。

这样独特的文明体，决定了有其独特政治发展道路，有其独特的政治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

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中华民族真正要强起来，不仅依靠政治经济军事的硬实力，而且需要依靠文化软实力。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历来懂得文化主义的怀柔方略，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文

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因此，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势在必行，否则我们摆脱了挨打、挨饿的逻辑，也摆脱不了挨骂的逻辑。

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十九大报告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源流与基本内涵：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